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中国梦需要国际话语

□赖海榕

中国梦提出以后，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得到了许多肯定和赞誉，成为有效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一个新概念。

各国政界、商界、学界人士在媒体上纷纷发表评论，力图从中国梦的概念中解读出中国的意图和战略，十分关注中国梦的内涵及其实现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梦是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同时也是人民幸福的梦想，其中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内容尤其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有些人士对中国梦内涵过度解读，我们也在各种场合向国际社会声明富强的中国绝不称霸。中国不会富而称霸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国在历史上强盛时期就是一个和平国家，对其他国家没有领土野心，这是强有力的论据。但是我们还要扩大视野，看到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和平国家并不多，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来说，国强称霸是他们更深的记忆。因此，我们在传播中国梦时，还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考虑到世界各国的经历与中国的经历不同，考虑到更普遍地存在于各国人民脑海中的记忆，并针对这样的记忆解说清楚自己的故事。比如，我们要强调中国梦的实现不仅能够带动世界各国的发展，而且也深深依赖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小的国家，中国只有加入和深化参与国际分工，才能调动全世界的资源和财富为中国所用，当然这个过程也是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为全世界所共享的过程。中国梦的实现仅仅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还不够，还需要依赖通过平等互惠的交换所得到的世界各国人民勤劳智慧的成果。因此，中国梦的实现不是对其他国家同样美好梦想的取代，相反，没有世界各国人民对属于自己的同样美好的梦想的追求和实现，中国梦的实现基础也将是不牢固的。因此，中国梦的提出不仅是对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的激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热切期待和美好祝愿。

基于中国梦的实现高度依赖世界各国人民实现自己梦想的认识，中国即使繁荣发展起来，也只是繁荣发展的世界的一分子，中国也许是繁荣发展的世界里一个相对较强大的实体，但是绝不是唯一强大的实体。中国即使富强也不称霸，不仅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称霸的主观意愿，而且普遍繁荣发展的世界里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称霸的客观条件。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相互牵制，任何国家想要称霸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在一个各国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一旦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和反对，再强大富裕的国家都没有前途，都将很快衰落下去。因此，中国即使富强了也不称霸是由世界的普遍繁荣和紧密联系的格局所客观决定的。

国际社会除了高度关注中国梦的内涵，也十分关注中国梦实现的途径。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宣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经过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了市场体系，但是由于历史发展轨迹的影响，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世界各国普遍认识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有一定的距离，并且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富有特色。在有强烈的中国特色的理论、制度、道路基础上实现中国梦，将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一般认识产生差距，这是自然的，也是我们应该着力沟通的问题。我们应该在实践上进一步改革开放，加大市场趋向的改革力度和步伐，同时在理论上清楚说明中国梦要通过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来实现。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一定是中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是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努力说明差异的原因，以便中国和世界能够更顺畅地相互理解和沟通。

我们应该强调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具有特殊性，中国梦的实现绝不意味着推翻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相反中国梦的实现将丰富世界各国人民对如何发展自己的认识。基于对中国道路特殊性的深刻认识，我们完全没有向任何国家和地区推广我们的理论、制度和道路的打算，我们相信各国人民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结合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成功不表明中国的具体做法可以移植到其他国家，中国的成功恰恰表明各国需要把自己的国情和普遍的经验结合起来。

我们还应该强调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不断完善中国所实行的各项制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持续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将持续不断地吸收全人类有史以来的各项先进文明成果。中国梦的实现不只是中国在物质力量上的增长和提高，而且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发展和完善。

由于中国梦的提出与中国历史有深厚的联系，而中国近代史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灾难深重的经历，因此也有部分国际人士担心中国复兴的目的是要报仇雪恨。这样的忧虑，不论是出于无意的误解，还是出于有意的曲解，我们都应该正视面对。我们应该向世界表明，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但是将超越历史。中国梦在精神气质上是宽厚的、阳光的、幸福的、快乐的，不是狭隘的、灰暗的、苦恨的、悲情的。中国人民虽然有受难的历史，但是中国人民追求快乐的未来，而且正是因为中国有受难的历史，所以特别警惕类似的经历不应在任何一个国家重演。这将是中国梦的愿景对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未来的积极贡献。

◆西方社会

英国高等教育的宽松培养模式

□熊 榆 宋雄伟

英国以占世界 1%的人口从事着全球 5%的科研活动；每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占世界总数的 9%，引用率达世界的 12%。截至目前，英国获得国际大奖的人数约占世界的 10%，共有 78 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是一个创新型国家。然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与其高等教育的宽松培养模式密切相关。

为学生创造宽松环境

充分考核。英国的高等教育几乎不存在“一考定成绩”的模式，他们的考核是通过长时间地考察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有助于剔除偶然因素的干扰，使得学生不会对某一个考试背负很大压力，而是在宽松的环境中，按照自己兴趣来学习成长。英国考核一般分为期末考试与追踪测评，即期末考试和平时测试各占课程分数的一定比例，一般来说，期末考试只占 50%~70%，其余则通过演讲、议论文、团队作业等方式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

充分保护。英国通过充分保护高校学生的权益，限制老师的权力，保证了充分考核的有效性。在英国，为保障课程和考试内容的合理性，以及考试成绩的公平性，课程从内容、结构、测试方式、测试内容、打分等都需要同行评审，经过内审人和外审人两道评审程序。在课程开始讲授前，课程负责人须将制定的课程内容、结构、 测试方式、测试内容，交给内审人评审，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后，提交给外审人，从而保证课程和考试内容对学生是合理的。英国为保证考试打分的客观公平，课程负责人作为第一评分人给学生打分，之后交给本门课程的内部评审人打分，如果两者对同一学生考评给出不同的分值，需要取得统一，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则需要第三个评审人，以保证不会因为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偏好或偏见，对学生的成绩带来不公平的结果，使得学生受到老师个人因素的束缚较少。另外，所有的成绩也需要送给外审人。

公开公平。由于前面提到的两点（充分考核与充分保护），保证了学生不会因为老师的权力过大而受到压力，学生也明白老师不会因为自己的言行而惩罚自己，所以在每学期两次的学生代表会议上，学生代表保持了独立的态度，经常对老师的表现大加褒扬或者批评，有助于反馈真实信息，而这些信息一定会得到学校的认真对待。学生也具备直接向全国性学生调查机构直接打分和反馈的机会，每门课程的反馈和分数都会被反馈到全国机构，然后发回给学校，给学校造成压力，并且这些分数和反馈将直接被用于英国高校排名。

为教师创造宽松环境

学者“地位”平等。在英国不论职称高低，学者地位相对平等。低职称的学术人员和高职称的学术人员的地位平等。比如，职称较低的老师也可自由参与各种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各位老师发言机会相等，学术观点的重要程度不受职称高低的影响。同时，职称较低的老师可以指导学术的研究，从而快速提高他们的研究成果。

充足的科研时间。英国研究型大学注重给予学者充足的科研时间，在相对宽松的时间长度里来“磨出好剑”。研究型大学一般要求学者与学生接触的时间在每年 120 小时左右，这基本等于 2 门课程，对于学者来说，这个工作量不算多。因为很多工作量由教员（Teaching Fellow）承担，得以让学者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出来。此外，每 3~5 年，学者可以申请休假（Sabbatical leave），学校会给予 1 年或者半年完整的时间，保持学者的科研进度。同时，很多学者不愿意承担行政事务，因为行政事务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相对科学的科研考评方式。科研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RAE） 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三地的高等教育基金会和北爱尔兰教育部联合组织，并对英国国内的高等教育进行科研水平评估的活动。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各个高校获得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英国的任何高等院校都可以自由递交科研评估材料接受评估。RAE 的评估组分为两级，分别是 15 个大学科的评估组（Panel）和 67 个小学科的评估组（Sun-Panel），小学科评估组把评估意见反馈给大学科评估组，并接受大学科评估组的监督和检查。共有 1000 名左右的专家参与，其中包括英国的顶级专家和世界著名专家。例如，2008 年科研评估的指标由三大方面构成，分别是“研究成果”“研究环境”和“受同行业尊重”。

“研究成果”主要指参评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做出的研究绩效，包括论文、著作等材料。“研究环境”从侧面衡量研究机构的研究能力，包括该机构研究策略、组织管理水平、研究经费的数量和来源、学术研究生数量等。“受同行业尊重”主要衡量研究机构被同行认可的程度。



RAE 的评估的科学性体现。第一，公平性，评估方是非政府的中立组织，没有特定倾向，政府部门不参与评估，只起辅助和协调作用，较多国际权威专家参与评估，使得评估更具权威性、国际性和公平性。第二，透明性，在评估开始前，评估组会向社会公布高校需要提交材料的详细说明、评估标准、评估组信息，评估结果也会全部向公众公布（涉密的除外）。第三，注重科研质量，评估中注意定量和定性的结合，并侧重于定性，这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重质量而非数量的效果。第四，指标权重灵活，以上三大指标在不同学科评估中权重不同，以便因地制宜地体现不同学科的特点。第五，以学科而非大学为评估单位，能够突出学科特色，让大学聚焦发展，追求高品质，避免了某些大学只追求整体规模的粗放式发展倾向。英国下一次的科研评估将于 2013—2014 年实行，但将采用新的评价系统，即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这个体系正在制定和修改中，以便使科研评估更加科学合理。与国内一年一考评比较，英国的 RAE 和 REF 都是若干年一考评（一般为 5 年），让教授们有更多的长期机会专心研究、静心研究，鼓励慢工出细活。

合理的学术教研工资体系。英国的大学老师按照年薪制度，按照统一的学术教研工资体系（Academic Teaching and Research），一共分为 51 个等级（Points）。在这个工资等级之外，没有其他福利，但是如果学者做出了杰出的成绩，可以申请增加等级。这些工资等级的增加不是看一次成绩，而是根据一段时间的总体效果，由员工与学校谈判和相互谅解取得。所以英国学者相对心态平和，一般不急于尽快地出数量的成果，而是看重一段时间之后，做出一个高质量的成果，自己就在与学校的谈判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促进人才流动机制。创新人才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流动性强，有利于不同背景的人才之间碰撞出新的火花，更能激发创造力。英国高校学者的流动性非常强，这得益于其人才流动机制的推动。

首先，由于学校内部提拔程序相对复杂，而外部招聘程序相对简单，所以外校提拔比本校提拔更加容易，增加了人才流动性。在英国大学里面，只有相对很少一部分人是通过本校提拔而上来，都是通过外校竞聘而提拔的，也有员工采取本校对外招聘的时候报名以外部招聘的渠道进入。这一体制客观上促进了英国学术体制很强的交流性。

其次，英国大学更看重高水平学者本身是否能成为自己学校的全职员工，而不在乎这个学者原来的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所以，英国大学老师只要有 4 篇世界优秀水平的文章（不管文章的署名单位是谁），就会有很多高校伸出橄榄枝。原单位可能为了保住一个优秀的老师，在对方大学给出“聘用通知书”后，给出“应对通知书”以和对方大学提出的优厚待遇抗衡。

再次，高校的招聘过程极其公正，避免人为因素影响人才流动。学校在招聘过程中，一般采取学术简历和人事简历分离的做法。人事部门只审核其基本档案。而学术部门或者招聘院系不会接触到应聘者的人事简历，只能看到其学术简历，从而避免以貌取人、讲究学术出生和关系的人才招聘潜规则。此外，在竞聘过程中，竞聘者一般会被要求提供 1~2 封推荐信。竞聘者本人不能接触并获知这些推荐信的具体内容，保证其有效性。另外，离职容易。竞聘者在获聘成功新单位后，只需向原学校提供辞呈，并获得二级学院科研副院长的签字认可即可离校。

◆环球瞭望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

□邓文钱

韩国自 1970 年开始实施“新村运动”。起初阶段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活条件，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后来延伸到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提升农村产业化水平，并在全国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民间组织，把“新村运动”推向了高潮。韩国“新村运动”对加快城镇化步伐、实现城乡一体化、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 1970 年起，在不到 30 年时间里，韩国农业人口减少了 990 万人，农业总产值增加了 2767 万美元；1998 年农户平均收入达到 19897.10 美元；2001 年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到 7.7%。经过 40 多年的实践，韩国基本解决了城乡失衡问题，实现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2011 年韩国城镇化率高达 91.1%，高于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水平，成为世界上城镇化发展比较快、城镇化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韩国“新村运动”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其他国家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坚持政府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韩国政府通过实施农村工业化，缩小农村和城市的差距；通过立法手段，制定城镇建设的相关法案，为政府干预和指导城镇化问题、保障城乡的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行动指南。20 世纪 70 年代，为了促进小城镇发展，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小城市培育事业”阶段（1972—1976 年）、“小城镇培育事业” 阶段（1977—1989 年）、“小城镇开发事业”阶段（1990—2001 年）。到了 80 年代，韩国政府又为“新村运动”立法，对“新村运动”的性质、组织关系和资金来源都作了详细的规定。此外，成立了全国性的领导机构“新村运动本部”，并在各直辖市和道（相当于省）成立“新村运动指导部”，在各市和郡（相当于县）成立了救持会，健全“新村运动”指导网络。进入新世纪，韩国政府先后制定《地方小城镇培育支援法》（2001 年）和《小城镇培育事业 10 年促进计划（2003—2012 年）》，促进了新一轮小城镇发展的高潮。所有这些举措都为顺利推进“新村运动”提供了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发挥村民在城镇建设中的主体作用。韩国政府认为，尽管不同的发展条件和目标，但具体选择哪些项目，最终由村庄独立决定，不能强制推进。在“新村运动”初期，由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对改善农村落后面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20 世纪 70 年代末，韩国“新村运动”达到了预期目标后，政府行政领导逐步退出了“新村运动”，村民建设的自治力量开始兴起。全国各地以行政村为单位自发地组织了开发委员会主导“新村运动”，吸收全体农民为会员，并成立了青年部、妇女部、乡保部、监察会和村庄基金，自发组织修筑乡村公路、整治村庄环境、发展文化事业和社会救助等活动。在“新村运动”中，政府坚持以村民为主，发挥了村民的主体地位，鼓励民间组织积极参与。政府只是在政策和技术方面给予引导和支持，以确保城镇化建设的方向和政策的落实。在物质支持上，韩国政府通过实物形式加以扶持，据统计，1970—1978 年，平均每个村获得水泥 84 吨，钢筋 2.6 吨。在政策引导上，政府实施了奖优的开放政策，充分调动村庄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新村运动”逐步完成了从政府支持下的民间主导到民间完全主导的过渡。韩国城镇化的成功实践，很大程度上在于韩国及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处理好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关系，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组织的良好衔接。

实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战略。在“新村运动”初期，韩国主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城市网络群带建设，实施了大城市为龙头带动、集聚效益为发展目标的区域发展战略。围绕汉城—釜山铁路沿线的中心城市，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创汇产业，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进入中心城市。上个世纪 80 年代，韩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形成了西海岸和东南沿海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格局。由于大城市人口猛烈增加，韩国又制定了“建设卫星城市”方针，兴建了城南、龙仁等 10 座卫星城。通过轨道交通与大城市交通线对接，形成了包括首尔、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韩国还先后设立了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蔚山 等 6 个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2012 年，韩国在中部地区还成立了具有履行行政职能的世宗特别市，其重要目的就是缓解首都的过度拥挤，拉动中部经济的发展。为提高中小城市的发展条件和投资环境，韩国通过改善农村交通条件，发展水、电、暖等基础设施，配套相应的医院、学校、银行等公共基础设施，扩大了小城镇的承载能力，较好地处理了农民进城和城市容纳能力之间的矛盾。经过几十年发展，韩国基本实现了“大城市带头发展，中等城市协调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的良好格局。

利用多种渠道筹集城镇建设资金。由于基础设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韩国政府多方面拓宽筹资渠道，鼓励更多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以政府与民间资本共同建设的格局。韩国《小城镇培育事业 10 年促进计划》规定，行政自治部、国库补助资金管理部门、门道政府、市郡政府对于小城镇建设各自承担资金的比例为 2:2:1:1；此外还鼓励民间投资，韩国政府制定了《基础设施吸引民间资本促进法》等政策法规，并设立国民投资基金，利用银行贴息的办法低利率贷款给基础设施承建企业，以此来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这些灵活、多渠道的措施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

落实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韩国在“新村运动”中，实施严格的村民监督管理制度，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作了明确的规定。面（乡镇）级管理职责主要负责在村调查研究，收集整理有关数据，检查新村运动的执行情况；郡级（县级）管理职责主要是发现农村基础组织的有关情况，监督检查中央分配下达的物资是否及时、准确送达；道（省级）、中央级管理职责，及时掌握郡、面、村的实际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的政策措施，对出现的问题加以矫正和推进；内务部部长主要收集全国的情况，及时制定和调整有关政策。在村民监督方面，为确保政府投入的大量财物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农村建设，规定所有财物以村委单位申报领取，各级政府部门不得参与工程建设。每个村配备一名公务员负责统计工作，并接受村民的监督。政府能否将中央分配下达的支援财物顺利送到村里作为考核公务员素质的重要标准，公务员的晋职升薪与在“新村运动”中的表现直接挂钩，这从行政监督和行政管理层面畅通了上下联系的渠道。此外，各村的村民代表可以参与到郡、面政府的决策会议，并对决策发表意见和建议。

组织多元化力量推进城镇文明建设。韩国政府积极鼓励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新村运动”，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为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修建了村民会馆、敬老院、读书室、运动场、娱乐场、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农村文化设施。通过多种的文化娱乐活动，逐步培养村民的“勤勉、自助、协同、奉献”精神。韩国实施了“志愿指导员”制度，志愿义务工为了区域共同体的发展，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还要自发行动起来，利用自己的知识、能力无偿为社区提供服务。一般义务工作者大多数来自大学教师、大学生等素质比较高的群体。这些志愿者队伍走进农村，深入农民，在相互沟通交流和不断交往中加深了农民与城市市民之间的文化融合。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调动了农民参加“新村运动”的积极性，而且还提升了农民文化水平和人文素养。

“新村运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农民为主体，改变农民以往保守的态度，唤醒农民“自立自强”的意识，让更多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新村运动”造就了大批道德和文化素质较高的城市居民，避免了因大量农民进城引发的社会问题。“新村运动”不仅成为农村城镇化稳步发展的动力，而且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润滑剂。